

盛唐文学

葛晓音

从1986年底到1987年，盛唐文学研究论著的数量虽不算多，但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动向。最突出的变化是：纵向或横向的宏观研究文章明显增加，研究的重心已从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转向探索某一类文学体裁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内的发展轨迹和沿革关系；或是通过考察某些作家群的交游和创作活动，来展现某一历史阶段的文学面貌。如赵昌平的《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一文，通过对初盛唐七古发展历程的分析，指出：盛唐七古对初唐的承革，体现于三个方面：其一，句式声调由骈中间散，以散行骈到散中间骈，以骈凝散；其二，诗歌意象从“体物成章”，写情以见志，到得意乘兴，探象于冥搜；其三，布局取势从宛委曲折、潜气内转到镰角钩折、驰骋合度。这就从七古的表现艺术和格调形式等方面详细而清晰地论证了初唐四杰歌行逐渐过渡演化为盛唐歌行的内在规律。王祥的《初盛唐文的演进与古文运动》（《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一文，将初盛唐文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认为其演进的轨迹

大致上可作如下概括：“一方面继承了前代骈体文、散文的某些传统，另一方面也将其他文体（主要是赋、诗）的某些写法吸收过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初唐四杰等的辞赋家之文，到盛唐诸子的诗人之文。而这种状态，又与当时文论有关：

“一方面，不断对齐梁文风奋起反击，另一方面又不断勤奋探索，从一开始对单纯功利性目的的文学的要求，到对文学本身规律的逐步认识，从阳刚壮美风格的提倡，到清新自然风格的呼吁，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特色”。但“由于人们对文学散文的特性并未完全认识到，时尚所重仍在诗赋碑铭”，加上“儒家思想停滞不前”等原因，因此又限制了散文的发展。初盛唐文历来是唐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空白，有趣的是近来有不少同志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这一点。1987年集中出现了一些论述初盛唐文与韩柳古文运动之间关系的文章。屈光《盛唐李萧古文集团及其与中唐韩愈集团的关系》（《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和汪晚香《论唐代散文革新中的萧李集团》（《湖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都较深入地考察了李华、萧颖士、贾至、独孤及等人的交游关系及其在文坛上的影响，阐明了这批向来不甚受人重视的古文家与韩愈在人事和思想上的联系。屈光同志引证大量材料，指出：“自天宝初至大历末近四十年中，文坛上活跃着一批复兴儒学的古文家，一个通过交游和师承关系形成的古文集团——李萧古文集团，在人事交往方面与韩愈家族有密切的联系，在古文理论和实践创作上都为韩愈集团奠定了基础，并通过集团的第二代盟主梁肃直接启蒙了韩愈集团。”这个集团“具有一个文学流派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首先是“交往密切，友情深挚”；其次是“相互推许，共操文柄”；第三是“广收门徒，传道授业”；文章还据

此进一步证实了沈曾植认为李肇所说“天宝之风尚党”主要是指萧李诸人而言的观点。汪晚香同志认为，萧李诸人在呼朋引类、奖掖后进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集团。他们“互相为文集作序，以彼此提携、互相揄扬、递相祖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俨然文坛上的一派一党”。文章引证梁肃与萧李的关系，以及韩愈直接继承独孤及、梁肃这一文统的关系，说明由萧李而韩，是“衣钵相授，薪火相传”。并在列举前人对萧李的评述之后，总结出这一集团的几点特征：一、萧李之前虽有陈子昂张说的散文革新，但只有待萧李“比肩而出”，其道才“益炽”，“才开始了唐文三变中的一个大变阶段”。二、他们所说的“文”、“文章”，其习惯含义虽也包括诗，但侧重点已是散文。三、萧李集团“是以先秦两汉之文为典范”。四、“改革的实绩”是使原来“尚排偶”之文，“始解散为古文”。他们对道的理解，由较为泥古逐渐发展到较为务实，重视经世致用，力求把明道同为现实政治服务结合起来；在文与道的关系上，由重道轻文逐渐发展到重道不轻文，由一味强调明道，逐渐发展到也重视反映现实，由一味宗经逐渐发展到也重视师汉。萧李集团最根本的一点不足是“未能正确处理复古与创新的关系”。这两篇文章对盛唐后期古文家的文学活动和历史功绩作了较为翔实的考订和客观的评价，将唐代古文运动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近年来研究盛唐文学，虽然注意到开元天宝年间社会政治情况的差别，但一般都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来考察的，重心多放在开元年间。熊笃的《天宝文学编年史》和傅璇琮、倪其心的《天宝诗风的演变》（《唐代文学论丛》总第八辑）则截取历史的横断面，通过深入研究不同阶层和地位的作家不

同的创作活动，展示出天宝年间复杂的文学状况。卢季野同志认为，熊笃的《天宝文学编年史》“充分吸取了前人丰硕的研究成果，广征了有关诸家年谱、编年、评传、考辨、选注、评论等各种文献资料约九十种，并加以鉴别”、“辨正天宝二十七位作家、四百多件代表作品的系年和内容，做到了或补裨史乖，或匡正旧说，或有所发明”，“旨在通过辑集和考订作家的家世、行踪、信仰、交游和创作活动，从微观上弄清天宝文学究竟是‘怎么样’的”（《解开盛唐文学的繁荣之谜》，载《重庆日报》1987年3月6日第4版）。傅璇琮、倪其心则借鉴勃兰兑斯的研究方法，“注意于社会生活与文学流派的多样化联系，并努力从整体上来把握作家群的时代情绪和心理活动”。

《天宝诗风的演变》一文认为，从开元末到天宝年间，至安史之乱爆发之前，诗歌创作有三个趋势是明显的：一是超脱现实，清高隐逸。这一趋势由张九龄、孟浩然开端，王维“进一步推进发展”，一是正视现实，抨击黑暗，以王昌龄、常建、李颀、李白、高适、杜甫为代表；一是愤世疾俗，崇儒复古，以萧颖士、李华、贾至、元结等为代表。文章通过对三类趋势的具体分析，概括出天宝诗风的基调：“纵观天宝时期的诗坛，使我们感觉到不少诗人似乎从开元盛世的光圈中走了出来，他们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幻想式的雾气，而逐渐学会用一双清醒的眼睛来看现实，我们发现他们饱含诗意的眼神中竟如此的忧郁，人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深刻的不安。”《唐代文学论丛》编辑部认为这篇文章“研究方法和立论的新颖，都能给人以较大的启发。”

本年初，还出现了几篇采用比较的办法来研究盛唐作家的文章，如张国伟《李白、王昌龄的绝句艺术比较探索》（《河

北学刊》1987年第1期),贺新居《王孟诗歌之比较》(《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浩《王维与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之比较》(《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等等。对风格相近的作家进行比较,有利于开拓思路,看出文学沿革的轨迹,不失为一种好的研究方法。但也有个别文章只是将人所熟知的观点重新排列组合,缺乏新意。怎样才能透过表面现象的比照,进一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尚有待于研究者的努力。

盛唐作家研究历来集中在王、孟、高、岑等名家,近年来张九龄、王昌龄等作家刚开始受到重视,其余二、三类作家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少空白。由于偏重宏观研究,热衷于吸取新方法以改变研究路子,本年用传统方法对作家作品进行微观研究的文章明显减少,仅见陶文鹏《读张九龄山水诗札记》(《光明日报》1987年3月24日第3版)、武安国《崔颢诗论》(《南都学坛》1987年第2期)等少数几篇。看来,如何充分深入地展开对盛唐一般作家的研究,以避免宏观研究和新方法研究成为潮流之后所产生的偏向,或许又将成为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